

励耘文库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张 健 / 总主编

钟敬文文选

董晓萍 选编

中华书局

励耘文库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张 健 / 总主编

钟敬文文选

董晓萍 选编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钟敬文文选 / 钟敬文著; 董晓萍选编.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3

(励耘文库)

ISBN 978 - 7 - 101 - 09245 - 5

I. 钟… II. ①钟… ②董… III. 民族文化—中国—文集 IV. K2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3)第 046429 号

-
- 书 名 钟敬文文选
著 者 钟敬文
选 编 者 董晓萍
丛 书 名 励耘文库
责任编辑 李天飞 俞国林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33¼ 插页 2 字数 460 千字
印 数 1-2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9245 - 5
定 价 98.00 元
-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编辑委员会

名 单

主 编:张 健

副主编:李国英 李春青 李 怡(常务)

编委会成员(姓氏笔画为序):

刁宴斌 于天池 王 宁 王富仁 朱金顺

刘 勇 李国英 李 怡 李春青 赵仁珪

赵月华 张 健 陈 惇 聂石樵 郭预衡

童庆炳 谢纪锋 董晓萍 谭得伶

总 序

“百年师大,中文当先”。描绘北京师范大学中文学科的发展历史,这是一句经常被征引的判断,在一个较为抽象的意义上,它的确昭示了某种令人鼓舞的气象。不过,“百年”来的中国社会文化实在曲折多变,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也可谓是源流繁复,“当先”的真实意义常常被淹没于时代洪流的连天浪淘之中,作为“思想模式”与“学术典范”的师大中文传统期待着我们更多的保存、珍惜、承接与发扬。

现代中国的高等教育肇始于京师大学堂,由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而有1908年5月的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进而诞生了1912年5月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当然,也是在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诞生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翘首的北京大学。“办理学堂,首重师范”,作为与北京大学“一奶同胞”的北京师范大学,正是秉承这样的理念引领了现代教育与文化的发展,其首勋业绩由此铭篆于史。从京师优级师范学堂里走出了符定一,我们优质的中国语言文学教育让这位著名的教育家与语言文字学家在后来创办湖南省立一中、执掌岳麓书院之时胸怀天下、垂范后学,培养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代优秀青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中文学科更是云集了当时中国的学术精英,如鲁迅、黎锦熙、高步瀛、钱玄同、马裕藻、沈兼士,不时应邀前来讲学的还有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思想名流,可谓盛极一时。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辅仁大学,京师中文学科的漫漫历史清晰地记录着中国现代语言文学的学术历程与教育历程,这里,活跃着众多享誉中外的学术巨匠,书写了现代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华章:从九十多年前推行白话文、改革汉字,奠定现代汉语的基石到半个多世纪以来开创现代中国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卓越贡献,诸多学科先贤都将自己坚实的足迹留在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旅程中。

伴随着北京师范大学参与和引领现代中国学术坚实旅程的,则是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风波与激浪,这里交织着进步对落后的挑战,正义对邪恶战斗,真理与谬误的较量,作为民众教育基本品质的彰显,我们的学术精英从来没有将自己的生命超脱于现实,从来没有放弃自己关注社会、“为了人生”的责任和理想,中国第一流的语言文学学术哺育了中国优秀的校园作家,从黄庐隐、冯沅君、石评梅到苏童、毕淑敏、莫言,他们以自己的热情与智慧描绘了“老中国儿女”的受难与奋斗,为现代语言文学的学术思考注入了新鲜的内容;同样,在“五四”运动,在女师大事件,在“三一八惨案”,在抗日烽火的岁月里,北京师范大学的莘莘学子与皓首穷经的教授们一起选择了正义的第一线,在这个时候,他们不仅仅以自己的思想和智慧,更是以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实践着中国士人威武不屈、身任天下的人格理想,他们的选择可以说是铸造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另一重令人肃然起敬的现实品格。

质朴坚韧的学科探求与身任天下的忧患意识,这不就是值得我们保存、珍惜、承接与发扬学术传统么?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励耘文库》中增选一套能够记录、保存、彰显师大中文传统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系列,系统全面地总结我们曾经有过的学术业绩和文化贡献,希望今人能够借此缅怀我们的历史,又不断从中获得继续前行的力量。

新世纪的中国,经济的繁荣与精神的隐忧并存,文化的多元与选择的歧路同在,作为新时代的教育家,作为新的学术事业的继承人,如何回首我们的历史,如何领悟我们的使命,又如何理解我们的传统,这些话题本身的复杂与沉重远远超过了词语表述的轻松,在这个时候,重温先贤的智慧或许大有裨益,但愿这些温润的文字能够引领我们重返深厚的过去,走向更为辽阔的未来。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励耘文库·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编辑委员会
2010年3月10日

序 言

——呈献于导师钟敬文先生 110 周年诞辰之际

董晓萍

钟敬文先生(1903—2002),广东海丰人。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诗人、散文家和作家。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36年回国。曾先后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西湖国立艺术学院、江苏无锡教育学院、北京香山幼儿教育师范学院、香港达德学院、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留在北京师范大学,历任校副教务长、科学研究部主任、中文系主任、民间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所长等职。一级教授。国务院学位办首批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首批授予的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政协委员等。

钟先生在世界范围内创立了“民俗学的中国学派”,被国际同行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在我国现代人文科学中,他创建了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两门学科,同时是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高等教育事业的奠基人。在我国进入全面现代化和全球化时期之前,在历次国内大规模搜集整理民俗民间文艺资料运动中,他都是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执教长达53年,创建了北师大民俗学国家重点学科,培养了大批研究生人才和留学生,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钟敬文先生的重大学术、文化、教育成就和社会活动影响,反映在他一生撰写的大量著述中。主要学术代表作:《钟敬文民间文艺论集》(全2卷)、《钟敬文文集》(全5卷)、《钟敬文全集》(全20卷)、《钟敬文民俗学论集》、《新的驿程》、《钟敬文学术著作自选集》、《话说民间文化》、《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民间文化讲演集》、《钟敬文学述》和《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等,教育理论与主编教材代表作:《钟敬文教育及文化文存》和所主编《民间文学概论》与《民俗学概论》,文艺学代表作:《关于鲁迅的回想与论考》和《兰窗诗论集》等。散文代表作:《西湖漫拾》、《荔

枝小品》和《钟敬文散文选》等,诗集代表作:《海滨的二月》、《未来的春》和《天风海涛室诗词钞》等。钟先生生前出版著作近70种,发表论文二、三百篇。他还有许多未刊著作,现在也在陆续整理和出版中。

本书的选篇范围,以钟先生已出版的著作为主,部分地参考了编者在担任钟先生学术助手期间,为先生整理的手稿或讲稿的原文,它们是钟先生在特定时间和具体题目上要阐述的学术思想的全貌,曾得到他本人的首肯,不受发表字数的局限而保留了下来。兹将之与已发表文章对应合并。本书的编排,按照上述代表作的分类,在学术著述部分,分为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民间艺术学和民俗文化学四类;在文学代表作部分,分文艺学和文学创作两类,共六类,力求比较全面地展现钟先生的学术文化成就。

钟先生是横跨学者与文学家两个不同领域的大家,读者会接受到两种不同的信息,而两者的区别在于作者处理的对象和性质不同。他的文学作品,文字优美而切近人心,适于进行社会传播。他的学术著述,不属于大众读物,不像文学作品那样容易把握,都有特定的理论思潮背景、治学传统、时代条件和科学著作撰写的要求,为了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他的学术思想成就,以下重点就本书所收的学术论文部分,阐述内容要点。

一、民俗学

钟敬文先生的学术文化成就,以民俗学为最。民俗学在他的学术人生和社会活动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民俗学确定了他的学问以人文学科定位。治民俗学,使他从诗人、文人,变成了学者,让他在东方国家的民俗学同行中,最早赢得中国人的位置。研究民俗学,也为他拓展原本较为熟悉的民间文学领域,提供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视角,促使他以新视角吸收本土的国学传统,后来他称之为“特殊文艺学”。以民俗学为业,还全方位地给了他一种将“民族国家”、“民众”和“民俗”相贯通的理念,让他始终保持自下而上的眼光从事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并由此获得思维、写作和人格的独立性。

钟敬文先生的民俗学著述,以《建立中国民俗学派》、《钟敬文民俗学论集》和《钟敬文先生文集·民俗学卷》为代表,另有论文60余篇,另主编全国高校文科统编教材《民俗学概论》一部。他的民俗学著述系列能够比较完整地反映他从事民俗学研究的轨迹。

钟敬文先生的民俗学,与我国其他民俗学者的民俗学研究,将之综合起来观察,可总结为民俗学的几个特征:一是从历史文献中剥离民俗学研究对象,再从实

地调查所得补文献之所无,二是从田野和文献中找到“民众”的对象,三是建立民俗学研究的具体个案,如斗牛与民间组织和民间经济活动、民俗与鼠、岁时风土和传统节日、水灾和地方传说、槃瓠神话和少数民族信仰、《粤风》和歌会民俗等。钟敬文先生虽然尚未明确地抽取出这几项,但正是由于他坚持从事民俗学研究,所以能在自己大量的学术文章和社会活动实践中涉及到这些领域,并从一些相似而广泛的不同角度开展研究工作,为形成这些特征铺垫了厚实的基础。

(一) 将民间文学作为民俗学的实体研究领域

钟敬文先生的民俗学,以1979年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中,他的民俗学更适于学术研究和社会运动;在后一阶段中,他的民俗学更适于课堂教学和扩展研究分支。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别,暂且抛开社会条件允许他发展民俗学的程度和空间因素不说,与他将民间文学作为一个实体研究领域有关,乃至他早在1935年就提出了民间文艺学的概念和进行学科建设的设想。

所谓将民间文学作为实体研究领域,指在我国这个文史不分家的文明古国中,历代经典、官方文献与笔记杂纂中的民间文学记载积累丰厚,已形成实体文献。我国自古有采风习惯,并流传后世,已成为国学传统中的实体活动。我国各地区各民族都有讲述民间文学的口述风俗,民间讲述人是一个庞大的实体群体。钟敬文先生将民间文学纳入实体研究领域,源自中国实际。民间文学研究实体化又使钟敬文先生的民俗学本土化,以及带有文人钟敬文先生的学历个性。

在我国现代学术史的早期阶段,将民俗学作为一个实体研究领域很难,这与民俗与社会主流意识体系的差异形态有关;尤其是民俗中的所谓“迷信”信仰和民间宗教化倾向,与我国这个非宗教国家的正统思想体系相左,宗教学研究也长期薄弱,单凭民俗学孤掌难鸣。就在钟敬文先生下决心将民间文艺学当作实体领域建设的前一年,他已意识到民俗学不可能采取雷同的实体化做法。他在1934年发表的《〈民俗园地〉引言》一文中说:“民俗学这种学问,在中国走着的命运是颇为奇诡的。……就学术的团体来说,到现在竟没有一个比较坚实的这种学问研究机关的组织存在。”他认为“比于西欧或日本学术界颇有愧色”^①。其实中国有民俗学基础,却不能像当时世界民俗学先进国家那样建立实体领域,恐怕也正是民俗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特征所在。人文科学对文化环境和文化的社会制度有依赖性。此外,民俗学的结构庞大,需要多门类的知识,这些知识需要“大师式的人物”去统领,对

^① 钟敬文《〈民俗园地〉引言》,原作于1934年1月5日,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第519页。

此,钟敬文先生是要给自己预留准备的时间的。他后来说:(民俗学)“是一个大系统,它包含着众多的小学科。……像这样活动范围广阔的科学,一个学者(他不可能三头六臂)要包揽齐全是不可能的”^①。所以,在他当时的条件下,对民俗学的实体领域建设还要放一放。

以往研究我国现代民俗学史的文章比较关注早期民俗学的外国人类学来源,并由此会多少与钟敬文先生联系起来,其实这对未曾出身人类学的他来说,未见得客观。在20世纪前半叶用人类学给予民俗学界以直接影响的,应该是周作人、杨堃和费孝通等。而钟敬文先生在本质上是个民俗学的民间艺术家。他的浓厚的民间文学意识转化为他的民俗学气质,这是他很独特的地方。当然他也受到外国人类学和其他外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通过他的民间文艺学思想发生作用的。一般讨论的“文化人类学的民俗学”、“社会人类学的民俗学”等,都是指西方框架下的民俗学,这并不能完全准确地概括钟敬文先生个性的民俗学思想和治学历程。

钟敬文先生治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多有叠合。他的民俗学论文,其中最早的一篇发表于1926年^②,最晚的一篇发表于2001年^③,首尾75年,这与他从事民间文艺学的时间相埒。他稍后提出建设民间文艺学,是在他投入民俗学之后才开始的。而将两者的驱动力比较可见,在他的学术轨迹中,不是民俗学拉动了民间文艺学,而是民间文艺学拉动了民俗学。钟敬文先生对民间文艺学的理论构想和教材编写都更早成型,早于民俗学半个多世纪,这就形成了钟敬文先生民俗学的一种个性。了解钟敬文先生个性的民俗学,对我们理解钟敬文先生的民俗学思想,乃至认识中国民俗学的学说构成和发展脉络都有帮助。

钟敬文先生将民间文学作为一个实体研究领域,来自他的三种倾向,一是五四倾向,即从民俗研究社会文学和民族历史;二是本土倾向,即从民间文学研究民俗;三是文化倾向,即从民俗的演变寻找文化遗产的规律。他一生都有这三种倾向。

1. 五四倾向

在我国,将民间文学视为实体文献,以之观察社会历史中的“兴、观、群、怨”,

^① 钟敬文《自序》,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自序》第1页。

^② 钟敬文《惠阳崧仔山畲民调查》,原作于1926年3月15日,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第359—363页。

^③ 钟敬文《十年纪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期。

这种观念古已有之。经过晚清思潮的铺垫,到了五四时期,又受到当时欧美先进学说的影响,这种民间文学的实体观被用来观察和解释受压迫社会阶层的文学和被侵略民族的历史,突然火红起来。钟敬文先生切入民俗学的契机是五四,这时对他来说,民俗学是一种大意识,能让他从民间文学中看到社会历史的整体问题,看见国家的世界位置和未来。

在1930年初的一篇文章中,他说:

记得刚刚逝世的梁任公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几句话:“我国幅员广漠,种族复杂。数千年前的社会组织,与现代号称最进步的组织,同时并存。试到各省区的穷乡僻壤,更进一步到苗子番子居住的地方,再拿二十四史里头蛮夷传所记的风俗来参证,我们可以看见现代社会学者许多想象的事项,或者证实,或者要加修正。总而言之,几千年前一部竖的进化史,在一块横的地平线上可以同时看出,除了我们中国以外,恐怕没有第二个了。”

真的,这话一点没有说错。我对朋友谈起天来,也常常道:“我们所处的这个庞大而古老的中国,当前所有一切的文物,在‘现代的’这个意义上,是显然地表明出它拙劣、腐烂、落后了。但我们如果换一副眼光去看,这就是说暂时丢开了恳切地希望着祖国的复兴的热忱,而以纯客观的科学家研究的态度临视着它,那末,我们不但不至于感伤失望,却反要忍不住踊跃三百呢!”并不是夸张地说,这一切历史及社会所馈赠给我们的事物,是怎样地便于作学术上的探讨啊!就民俗学的范围说吧,许多重要的关于初民的信仰及社会组织形态的材料,在文明先进国如英、法等的学者,要辛苦地到文化比较落后的非洲、澳洲及亚洲、美洲的一部分野人部落中,才有机会发现获得的,在我们国度里,却如何丰饶地排列着,而让人取之不尽哟!怪不得从前我的一位同事,一天在教授“初民心理”的时候,学生们听了发言道:“这不是什么野蛮人的心理,说的正是我们乡下老百姓的情形呢。”^①

涉足民俗学,让他由此关注五四时期热烈讨论的社会改革问题,并从民俗学的角度加以再思考,包括中国与当时世界“文明先进国”的差距,中国的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的两层文化划分,从政治上讨论文化改革,并“暂时丢开了恳切地希望着祖国的复兴的热忱,而以纯客观的科学家研究的态度临视着它”的矛盾。他由此关注国家的现代化运动的正确途径,也决心充实个人的理论储备。

^① 钟敬文《关于民俗——为杭州〈民俗周刊〉创刊作》,原作于1930年代初,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第524—525页。

我1934年下决心去日本留学,抱有两个明确的目的:先是“办货”。面对祖国民俗藏量极为繁复的现实,我感到原有理论和方法的力不从心。而国外民俗科学的进展,远的且不说,当时东邻日本就走在我们的前面。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我不能不受到一种强烈的振兴民族文化科学的心情驱使。我要去那里采经探宝,回来开设我们中国自己的民俗学“铺子”。其次,是去考察日、中相似文化中,民间文学、民俗学方面的联系,以利认识祖国的民间文化。^①

他是从五四一路走来的学者,在20世纪,五四历史事件的巨大影响,没有几个其他历史事件能替代。它决定了国家文化的转向,也改变了个人的命运。这种历史事件的氛围,非亲历者是无法感受的。后来人也不可能作出完全重复的表述。对钟敬文来说,他尽管选择了做纯学问的道路,但他仍然要用学问来拷问自己的爱国良心,这时民俗学就不能不成为他的良心学问。纯学问与爱国感情的界限于是变得模糊,这是五四爱国运动带给他的终生震撼,他一直到晚年都承认自己是五四之子。

2. 本土倾向

钟敬文先生有文人本色,对民间文学有着天生的本土感。民俗学是一种包容民间文学的人文科学,这能让钟敬文先生将个人的本土感加倍地放大,并倒过来看民间文学,从民间文学去研究民俗。他最早发表的两篇民俗学文章《纪念两位早死的民俗学致力者——白启明先生与刘策奇先生》和《民俗记录二则》^②,都是讲民间文学的,而他都在标题中明白地名之以“民俗”,并说它们是本土文化的“写真”^③。

钟敬文先生对民俗学有本土倾向,还在于他认为中国民俗史料的发生历史悠久,历代文人在没有外国影响的情况下,已形成了自己的民俗见解、搜集积累和学

① 钟敬文《我与浙江民间文化》,原作于1987年9月14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② 钟敬文《纪念两位早死的民俗学致力者——白启明先生与刘策奇先生》,原作于1926年清明次日,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第321—323页。钟敬文《民俗记录二则》,原作于1927年春,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第364—368页。钟敬文还有一篇调查文章的撰写时间比此两文都要早,惜作者并未亲自去调查,而是对他人调查资料的转述和整理,故本文暂不将此列入作者自己的研究论文。参见钟敬文《惠阳崧仔山畲民调查》,原作于1926年3月15日,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第359—363页。

③ 钟敬文《民俗记录二则》,原作于1927年春,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第368页。

术意义。他说,中外比较之下,中国已有“近于一种‘原史’性质的东西”,只不过“学科起步比较迟”^①。由他的论断可见,民俗学的主体部分,它的资料系统和它的风俗化观念,在中国都是现成的。外来民俗学的用处,是提供了当时先进的科学分析理论和方法论。中国已“水到”,外国民俗学理论使之“渠成”而已。

民俗学本土化倾向的另一标志,是在适合本土的时间与地点,使之社会团体制度化。中国民俗学运动发轫于192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但中国民俗学会却于1928年在中山大学成立。钟敬文先生本人曾参加了“民俗学会的建立和风俗物品陈列室的设置工作”,处于这一历史事件的核心。他对中国首个民俗学会的南方化持高昂的学术态度,评价说:

这是附属于南方一个大学的民俗学会,……它不但开拓了中国民俗学的领域,在东亚人民文化研究史上也是引人瞩目的。日本的中国民俗研究家直江广治博士,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由于中大民俗学会的成立,中国民俗学走上科学的研究途径(见所著《中国的民俗学》中“中国民俗学的历史”部分)。这话虽有些溢美,但它证明中国现代这段学术史,在国际民俗学研究者眼中所占的位置。^②

钟敬文先生将这些史实视为民俗学作为“学科”扎根中国的机遇。他说:“历史不仅预先规定了我活动的舞台,也指定了我应该演和所能演的角色。”^③事实是,他选择了本土化的方式,本土化的民俗学也选择了他。

3. 文化倾向

钟敬文先生治民俗学,倾向于从民俗的演变发现文化传承的规律,这种倾向从开始就有,延续到他的晚年。关于民俗学的文化倾向,他有以下一些主要观点。

第一,民俗是一种社会群聚性文化,“在五花八门的人类文化品类里,风俗、习尚无疑是其中基本的一种。只要有人群存在的地方,便有风俗、习尚这种文化事物存在”。第二,民俗会演成流行文化,个体不能免俗。“人们在生产、政治、教育等方面的活动,都有某些流行的风尚存在其间。风俗、习尚,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里,几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如果让我们套用‘人是政治的动物’,‘人是社会的动物’

^① 钟敬文《自序》,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自序》第2页。

^② 钟敬文《60年的回顾——纪念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立60周年》,原作于1987年8月30日,原载《民间文学论坛》1987年第6期。

^③ 钟敬文《自序》,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自序》第2页。

等说法,那么,可以说‘人是习俗的动物’吧”。第三,民俗有文化史价值,适合开展文化史研究。“风俗、习尚,既然它存在的当时,是为人们需要服务的,那么,到了后代,就有自然文化史的价值,有提供各种人文科学研究的意义”^①。第四,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标志文化和国别特色文化,“每个民族,不管她的文野程度如何,总有她自然显示出来的一种特殊状貌。……当我们开始接触一个民族时,她的人民的生活中所流行的风俗、习尚,是最容易引起我们的观感的。它的色彩跟我们自己民族的差距越大,它所引发起来的观感也就越强烈。民族的风俗、习尚,可以说是每个民族存在的一种标志”。在“各国读者手里”,“他们,不管是到过中国,还是没到过中国的,我想,当这本画册摆在他们的面前时,一定会使他们眼明神悦、兴味滋滋,乃至引起许多遥想”^②。第五,将民俗学看成是动态的文化学。他认为民俗原封不动流传下来的很少,几乎都要发生变迁。他常举的例子是风筝的民俗,“现在清明放风筝(南方),谁再想到‘放晦气’的古代法术呢”^③?对他的这种文化学说,以近些年使用的符号学理论打比方,他的意思是,民俗是一套符号文化,它的现象是符号,它的意义是文化。这种符号文化根据人们的日常实践不断发生变动,符号变,意义也变。符号变得快而可视,意义的变化不可视。人们往往记住了符号的当下的意义,而忘记了符号的从前的意义。他进一步地概括说:“对于历史和当代的民俗文化现象,加以收集、整理、探究和描述的学问就是民俗学。”^④那么,从他的动态文化学角度说,民俗学者把所有民俗符号和文化意义收集起来,再加以研究和阐释,就是他构想的动态文化学。

(二)建立民俗学与历史文献的关系

民俗学之独立性之一,在于利用历史文献找出民俗对象的记载线索,同时发现历史文献记载和解释之不足。钟敬文先生与顾颉刚的相识与相知,共同塑造了我国民俗学的这一特征。1928年,钟敬文先生在岭南大学为顾颉刚整理了《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的演讲稿,钟敬文先生在稿件中记录了顾颉刚下面一段话:

① 钟敬文《〈民俗学特辑〉前言》,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第516页。

② 钟敬文《〈中国风俗〉画册序》,原作于1990年9月24日,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第447,449页。

③ 钟敬文《民间节日的情趣》,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化》,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第59页。

④ 钟敬文《〈民俗学特辑〉前言》,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第516页。

所谓旧文化,圣贤文化是一端,民众文化也是一端。以前对于圣贤文化,只许崇拜,不许批评。我们现在偏要把它当作一个研究的对象。以前对于民众文化,只取“目笑存之”的态度,我们现在偏要向它平视,把它和圣贤文化平等研究。可是,研究圣贤文化时,材料是很丰富的,中国古来的载籍差不多十之八九是属于这一方面的;说到民众文化方面的材料,那真是缺乏极了,我们要研究它,向哪个机关去索取材料呢?别人既不能帮助我们,所以非我们自己去下手收集不可。^①

对民俗学者来说,这段话十分重要,因为它的背后是钟、顾二人于4年前开始的一段学术合作史。自1924年12月至1925年10月,钟敬文先生陆续向顾颉刚提供了历史文献中所缺乏的孟姜女地方口传资料,包括传说、民歌、戏曲唱本和方言故事^②,促成顾颉刚在古史研究中增加民俗,并使其历史地理研究方法得到完善。

钟敬文先生本人也关注文献学的发现。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大量使用岁时等笔记杂纂研究民俗,并提出如何认识、使用和解释这批文献的一些新问题。自1928年至1983年,他都有这类文章发表,例如:《介绍一部60多年前的风俗书——〈杭俗遗风〉》(1928)、《我国古代民众的医药学知识——〈山海经之文化史的研究〉中的一章》(1931)、《〈异民族土俗专辑〉序言》(1936)、《东国岁时记》(1937)和《〈北平风俗类征〉重刊序言》等^③。在我国正统典籍的经史子集归类中,这种文

① 钟敬文《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1928年3月20日顾颉刚先生在岭南大学学术研究会演讲记录》,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第631页。

② 钟敬文《关于孟姜女故事研究的通信》(五则·附顾颉刚按语),钟敬文《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第472—483页。

③ 钟敬文《介绍一部60多年前的风俗书——〈杭俗遗风〉》,原作于1928年3月24日,1997年1月20日补记,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第483—486页。钟敬文《我国古代民众的医药学知识——〈山海经之文化史的研究〉中的一章》,原作于1931年11月6日,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第191—211页。钟敬文《〈异民族土俗专辑〉序言》,原作于1936年1月10日,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第521—523页。钟敬文《东国岁时记》,原载《艺风》第3卷第8期1937年,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第487—494页。钟敬文《〈北平风俗类征〉重刊序言》,原作于1983年11月27日,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第437—444页。钟敬文《我国古代民众的医药学知识——〈山海经之文化史的研究〉中的一章》,原作于1931年11月6日,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第191—211页。

献属于“子”类,处于“经”和“史”之下,地位还不如“集”。钟敬文先生将之开辟为民俗文献,焕发了它们的生机。这种工作的价值,还在于对我国魏晋以来正统与笔记杂纂并行的叙事系统加以科学梳理,对两种叙事中都会出现的不同概念的“史”和地方文化与少数民族资料,增加了研究其“文化史”的导向。钟敬文先生早年对日本和韩国岁时文献的关注,以及与日韩学者在这方面的学术对话,使这方面的问题很早国际化,成为东方国家比较民俗学研究的题目。

(三) 风俗调查

钟敬文先生谦称一生不是田野学者,没有从文献资料的发现转向田野的发现。他也有搜集故事的活动和故事类型研究,但这种倾向没有转化为建立特殊社会史的具体个案。这对他从事民俗学研究是有局限的。

但钟敬文先生始终关注民俗调查,这与钟敬文先生将搜集民俗资料作为一个学科领域有关。他承认,他个人搜集资料活动的起点就是研究民俗学的起点。

我致力于民俗学工作,是从搜集民间文艺作品开始的。在本世纪 20 年代初期,我受了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后改为歌谣研究会)征集近世歌谣的影响,开始在故乡(海丰公平镇)一带搜集当地流传的民歌土谣。稍后,把搜集的范围扩展到一般民间叙事作品(神话、传说、幻想故事、民间趣事等)及其他民俗资料。差不多跟这同时,我对于那些野生的文艺,也初步进行了理性的考察(当时在《歌谣》周刊连续发表的一组《歌谣杂谈》,就是这种考察的初穗)。我当时在考察上所用的观点,主要是文艺学的。因为,国内现代意义的民俗学还在发生时期,没有多少理论上的成果;国外学说的介绍也是初步的、零散的;而我自己也只在文艺理论方面(包括传统的和新输入的)多少还有一些知识。^①

他有这样一种认识,即搜集资料能带动他的理论前进,在 20 世纪初民俗学还“没有多少理论上的成果”时,他的搜集民俗资料的凭借,依然能让他利用“文艺理论”知识,向民俗学破门而入。这是传统国学的思路。

钟敬文先生还有一个观点值得注意,就是搜集民俗资料的范围是民俗学理论发展程度的标尺。他使用这个标尺,观察外国民俗学的进展,也观察中国民俗学的研究方向,还能建设中国民间文化史。

众所周知,北大时期侧重搜集歌谣,中大时期扩大到传说、故事和风俗物

^① 钟敬文《我的民俗学思想的来龙去脉》,原作于 1996 年 1 月 24 日,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第 347 页。

品的征集,但由于仍受英国传统人类学派狭义民俗理论的影响,资料搜集工作还是比较局限于精神文化,尤其是口头文学和原始信仰的范围。到了杭州后,我们有些觉悟,感到只要属于人民的东西就需要注意,因此,将视野扩大到向来不被重视的一些民俗范围。例如前面提到过的民间绘画艺术。鲁迅这时站在左翼文学的角度,正在提倡用新的木刻为革命事业服务,我是赞成鲁迅的口号的。同时,也从民俗学的角度,意识到发扬这些民族的、大众的艺术,有益于开展直接的国民教育。故抗战前夜我们留心征集、整理和展览了这方面的民俗实物。再如民间科学、民间医药,在我国这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国,几亿民众曾“以食为天”,靠着他们积累和传承的土壤耕作、岁时节令、中医草药等知识,休养生息,世代繁衍。谁能否认这些民众知识的科学性!否认了它们,就无法解释西方文化输入以前,中华民族早已存在、发达了数千年的历史事实。当代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十分赞赏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就是从客观事实出发得出的结论。它也包括了对我国古代民间科学和医药发展水平的肯定。中国科技不过明代以后才落了伍。总之,收集民间科学、医药资料,能够丰富我们对祖国传统民间文化的理解。其他如社会组织及其一系列具有持久性的习俗、惯例的资料,也在我们的收集范围之内。这就比北大和中大时期的民俗学活动进了一步。^①

钟敬文先生搜集民俗资料学术领域化的倾向,导致他将这一工作运动化和爱国化。他也在搜集资料的实践中,找到了民俗学所要研究的“民众”的群体对象。

钟敬文先生重视使用风俗调查资料,使他发展了早年关于民俗的民族性观点,还发展了关于民俗的地方性观点,他说“风俗、文化,是有民族性的,同时又是地区性的”^②。此文写于1988年,当时全国范围内已展开新地方志搜集运动,他从中大力推动各地民俗志的搜集编纂工作。他这时将民族性与地方性并提,与五四时期讨论的国家民族性是有差别的,现在他更关注这场搜集运动的民俗学科收获。

钟敬文先生在风俗调查方面的理论建设有两点。一是传统节日民俗研究。他在1931年撰写的《金华斗牛的风俗》开启了这一问题的先河,后来他又陆续发表了

^① 钟敬文《我与浙江民间文化》,原作于1987年9月14日,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第336—337页。

^② 钟敬文《〈江南风俗〉序》,原作于1988年12月20日,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第458页。